

湘潭大学中国史文库

民国湖南学术思想史研究

Minguo Hunan Xueshu Sixiangshi Yanjiu

王继平等◎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湘潭大学中国史文库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结项成果

民国湖南学术思想史研究

Minguo Hunan Xueshu Sixiangshi Yanjiu

王继平等◎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湖南学术思想史研究 / 王继平等著. —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687-0286-7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湖南—民国 IV. ①B2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2473号

民国湖南学术思想史研究

MINGUO HUNAN XUESHU SIXIANGSHI YANJIU

王继平 等著

责任编辑: 暴红博

封面设计: 李平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湘潭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电话: 0731-58298960 0731-58298966 (传真)

邮编: 411105

网址: <http://press.xtu.edu.cn/>

印刷: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37

字数: 570千字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87-0286-7

定价: 76.00元

目 录

绪论 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王继平) / 001

上编 民国湖南学术思想研究

杨昌济学术思想研究 (周 萍) / 027

向达学术思想研究 (孙延青) / 074

杨东莼学术思想研究 (王凯丽) / 122

周鲠生学术思想研究 (赵 勇) / 163

中编 民国湖南史学思想研究

论李达及其史学思想 (吴少鹏) / 243

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 (汪 妮) / 292

周谷城史学思想研究 (朱 凯) / 351

论吕振羽及其史学素养 (郑和泽) / 397

下编 民国湖南文艺教育思想研究

齐白石艺术思想述论（曾 媛）/ 453

舒新城“新教育”思想研究（李景梅）/ 485

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研究（黄志强）/ 533

参考文献 / 571

绪论

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王继平

民国是中国学术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具有两个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一是延续了晚清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进程，实现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转变；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改变了民国学术界的面貌，并由此而诞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也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第一届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湖南籍院士有3名，而且集中在人文学科，他们是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和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法学家周鲠生，占28名人文学科院士的10.71%。此外，还出现了杨昌济、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向达、舒新城、李达、李剑农、蒋廷黻、齐白石、黎锦熙、田汉、欧阳予倩、丁玲、周扬、成仿吾、余嘉锡等一大批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以及作家、艺术家等等^①，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工作，构成民国湖南学术史的鸿篇巨制，在民国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 民国时期现代科学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与传统学术不同的是，它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门类。本书限于资料的限制和作者学科背景的局限，仅限于对民国湖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描述，自然科学领域暂付阙如。关于民国湖南学术史的下限，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限。就具体学人而言，则以其主要学术活动、学术成就以及学术影响为取舍。

一、湖南史学家的异军突起

经世致用是晚清湖南学术的传统，以经世为依归的史学研究则是晚清以来湖南学术发展的一大特色。晚清经世史学的开山代表作当属贺长龄与魏源通力合作的结晶《皇朝经世文编》，该书辑集清道光以前众多官员学者的奏稿论述，涉及学术、政事、文教、刑制、礼制、兵政、河务、兵防等，文章达 1300 多篇，辑为 120 卷，共 300 多万字，其中“言学之属六，言治之属五，言吏之属八，言户之属十有二，言礼之属九，言兵之属十有二，言刑之属三，言工之属九”。^①《皇朝经世文编》“是中国近代经世学的划时代文献，标志着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形成”^②。同时，也是晚清湖南经世史学之滥觞。经世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魏源、王闿运、李元度、李桓等，他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曾纪泽、陈天华、杨毓麟和曾鲲化等在史学方面虽无专门著述，但其史学观与经世史学为一脉相承。进入民国，史学研究仍然是湖南学术的重镇，出现了李剑农、翦伯赞、吕振羽、周谷城、向达、蒋廷黻等一大批史学家，成为民国史学界令人瞩目的史学家群体，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史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剑农（1880—1963），又名剑龙，号德生，湖南邵阳人，以研究政治史、经济史著名，代表作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李剑农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及补写的篇章合刊于 1942 年，2011 年中华书局再版）以及《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宋元明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李剑农主张历史进化论，并试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他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变化的考察，得出了历史是进化的过程。他认为，历史的进化过程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新者得半之位，而今日之新者，又渐为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7 页。

② 陶用舒：《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第 211 页。

余半之旧者，以次递演，斯为进化”^①。这种进化是渐进发展的，“凡社会组织之变革，及各种文化形式之成长，皆由渐次进展而来”^②。而且，进化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历史之进展常走曲线”^③。在阐明历史发展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基础上，李剑农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历史发展都是有其原因的，“历史的事变如流水，不能由我们用刀去截断。后时代的变化，都是在前时代已经成了问题，后时代的人物事迹，都是前时代的产儿。”^④他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出结论，指出历史进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冶金术渐次进步，其影响所及，工具随之改良，生产随之增进，分业随之繁密，金属货币随之成立，商业随之进步，社会经济出现空前之发展，同时上层建筑之政治结构亦开始发生变化”，皆由生产力的增进。^⑤这一结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但由于李剑农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又陷于历史循环论的局限中。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每次统一约二三百之间，必要经过一二次的小屠杀；到了二三百又要经过一次大屠杀。自秦汉以来，这种周期律的表现是历历不爽的”^⑥。“中国近三十年的政治史，大部分还是为中国旧历史上的周期律所支配。……所以近年来的混乱战争，纵然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也是不能免的。”^⑦

在史学方法上，李剑农重视史料的作用，主张应当用史料来说话，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他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⑧例

① 剑农：《调和之本义》，《太平洋》第1卷第1期，1917年，第2页。

②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8页。

③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3页。

④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1页。

⑤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页。

⑥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页。

⑦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647页。

⑧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页。

如,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不赞成当时流行的殷周起源论,认为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甲骨卜辞,而“现时所得之甲骨卜辞,既不足以包括殷代文献之全部,而甲骨文之尚未考释明白者,又居大多数也”^①,因此必须持谨慎态度。同时,李剑农还主张从整体上来研究历史,即将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并运用整合方法和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时,他将经济的发展变化当作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一个整合体来考察,尤注意各种因素的关联。同时,对南北方经济的状态进行对比研究,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李剑农不单纯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有强烈的用世想法,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民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萧致志教授所评价的:

李剑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足资后学借鉴。^②

民国湖南学术界另一位既具学者身份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的是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系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后弃学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外交史,著《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32年)、《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年)、《中国

①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页。

② 萧致志:《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近代史》(1938年)等,编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1931年,1934年),著述虽然不多,却是民国时期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师从海斯教授。海斯是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新史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强调史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功用。蒋廷黻深受其影响,这反映在他的史学撰述活动和史学著作中。他的史学代表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和《中国近代史》就是其体现。就中国国际关系史而言,当时比较权威的是英国人马士撰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蒋廷黻不满意马氏著作材料和观点的片面性,因而决心自己来做。按照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蒋廷黻发现和协助故宫博物院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并由此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中国外交史》的撰写,但这本资料集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中国近代史》则反映了蒋廷黻强调史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功用的史学思想。蒋廷黻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近代化的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①因此,他以近代化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评判的标准,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看成是相互衔接的、不断深化的近代化的运动。这种观点对国内史学界1980年代以来的片面的革命史观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北京大学讲师;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页。

1935 年秋到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工作，在英国博物馆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1937 年赴德国考察掠自中国的壁画写卷；1938 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从事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及《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

向达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中西交通史、中国边疆史地以及敦煌学等方面。向达旧学根底深厚，又曾留学欧洲，因此他的史学理论及方法具有中西兼备的特点。他认为：“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单只讲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务根本，只图眼前，则中国将来科学的前途，可能与同治时代的维新同其命运。”^① 他的《中西交通史》和《蛮书校注》就是中西兼通的史学典范。向达还特别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在 1942—1944 年三年中两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茫茫塞外间多次进行学术考察。向达曾亲自奔赴阳关、玉门关遗址，通过结合古书《史记》《元和志》《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和敦煌石室写本《寿昌县地境》中相关记载进行史地互校，对玉门、阳关遗址以及玉门改置一事进行了深入探究，使他的敦煌学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此外，向达还注重“以诗证史，诗文互参”的研究方法。在对唐朝“柘枝舞”进行考证时，由于诸多史料皆不存，向达于是另辟蹊径，采用“以诗证史”的方式从《全唐诗》中“寻章摘句”，进而对“柘枝舞”的名称来源、服装、舞姿舞态进行全面阐释介绍。^②

除上述三位史学家外，民国湖南史学界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以吕振羽、翦伯赞、周谷城为代表。

吕振羽（1900—1980），邵阳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

① 邓锐龄：《忆向觉明师》，沙知编《向达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67 页。

② 孙延青：《向达学术思想初探》，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重要奠基人之一，主要史学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

翦伯赞（1898—1968），桃源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1927年以后，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周谷城一生著述颇丰，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代表性著作有《生活系统》（1924年）、《农村社会新论》（1927年）、《中国社会史论》三卷（1931年）、《中国通史》两卷（1939年）、《中国政治史》（1940年）、《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年）、《世界通史》三卷（1949年）。

吕振羽、翦伯赞、周谷城求学和开始治学的青年时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得到社会科学界进步人士欢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或通过师友、或接触共产党员、或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逐步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在加入进步组织特别是加入共产党后，则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从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吕振羽是在1925年考入湖南大学结识李达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北京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相继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则是在吕振羽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周谷城则在五四时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认真研读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原著及有

关共产主义的小丛书，并与毛泽东在一师同事，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撰写了《论租谷》等文章，还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一书，在当时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1996年出版《新史学五大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五人称之为“新史学”五大家，湖南历史学家吕振羽和翦伯赞名列其中两家，反映了民国湖南历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也构成了民国湖南学术史辉煌的一页。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瞿林东先生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一文中写道：“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①的确，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论的输入，导致了王朝家谱式的封建史学的崩溃和以“叙人群之进化”的“新史学”诞生；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输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面貌。在这一转变的进程中，民国湖南学术界秉承了“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神，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学术，形成了民国湖南学术史的一大特色。

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术的湖南学者是李达。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达，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脱离党的实际工作之后，李达一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和研究工作，在学术的各个领域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作出了贡献，也是民国湖南学术界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术的学者，对湖南学术界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

① 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李达在学术上的贡献，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和传播。最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认识人类社会的真理。在党的创立时期，李达即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解剖，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初步的理解、阐释与运用。他最早一本哲学著作即《现代社会学》（1926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阐释的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最早、最系统的阐释。在这本书中，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全面地阐释了社会的本质、构造、起源、家族、氏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变革、社会进化、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社会革命等一系列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唯物史观解说》。^①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献，但李达却是最系统、最全面地阐释唯物史观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李达还在湖南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传播唯物史观，对湖南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学大纲》则是李达阐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经典之作。该书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同年再版三次。在该书中，李达完整地阐释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指出：“当作世界观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之普遍化的概括看的唯物辩证法，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两个领域，即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唯物论的自然观，以自然现象的发展法则为对象，因而它是自然诸科学的成果的概括；唯物论的历史观，以社会现象的发展法则为对象，因而它是社会诸科学的成果的概括。”^②该书毛泽东曾读过10遍，并称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作了推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

① [荷] 郭泰 (H. Gorter) 著，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1932年版。

② 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

其次，李达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关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唯物论的自然观与唯物论的历史观，是唯物辩证法与自然诸科学及社会诸科学之间的媒介的环。”^①他还具体说明了唯物史观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②，鲜明地阐释了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阐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重大贡献，也是民国湖南学术史上凸显的一页，成为民国湖南学术史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开端。历史学则是民国湖南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成为民国湖南学术史的特色，也是民国湖南历史学发展的特色。其中杰出的学者当推吕振羽和翦伯赞。

吕振羽曾直接受教于李达先生，他在考入湖南大学之后，由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夏明翰的注意，推荐他去听李达的“社会学”课程，从此结识李达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据吕振羽夫人江明回忆，李达时常告诫吕振羽，研究历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方法论，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不可误入实用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二是史料，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鉴别真伪，切不可歪曲历史的真相。^③

正是在李达的影响下，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民国时期，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

① 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

② 参见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③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辑。

史》《中国民族简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等，确立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吕振羽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也被学界视为其成名作，是他在中国大学当教授时，在其讲稿《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基础上写成。成书于1934年，是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作。该书由北平人文出版社1934年初版；1936年，日译本由东京改造社出版，题为《中国原始社会史考》；1943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将此书再版，题为《中国原始社会史》；1947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又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合辑本，书名定为《中国社会史纲》。翦伯赞曾经评价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①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进行系统考察，梳理并架构了中国思想史的系统，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先河。《简明中国通史》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中国通史，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于1941年在重庆完成并出版，下册1948年完成，1948年5月，上、下册一起出版。由此可见，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无论是在史前社会的研究，还是在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乃至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写，都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正如著名史学家蒋大椿所概括的：

（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期作出的开拓性贡献主要有：第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时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系统”。在史料学上，吕振羽则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第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第三，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论。第四，最早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理论根据，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作出了最初的划分。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提出者。第五，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修订四版），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70页。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开山之作。^①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的过程中，湖南另一位史学家翦伯赞也作出了贡献。翦伯赞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吕振羽对其影响很大。1928 年秋，经由弟弟翦仲襄介绍，翦伯赞与吕振羽相识。“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② 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翦伯赞受吕振羽影响，先后在 1930 年底 1931 年初发表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等文，初步展示了翦伯赞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成果。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从事党的活动之余，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即 1943 年、1946 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史纲》一、二卷，即今《先秦史》和《秦汉史》）、《中国史论集》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

翦伯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过程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两部著作之中。《历史哲学教程》是一本出版于抗战初期的探讨历史理论和方法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翦伯赞结合历史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了批判性的初步总结，集中反映了翦伯赞的历史观，有学者评论说：

《教程》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以社会史论战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为背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一些错误的历史理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或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多少发生一些支配作用

① 蒋大椿：《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历史教学》2000 年第 6 期。

② 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 页。